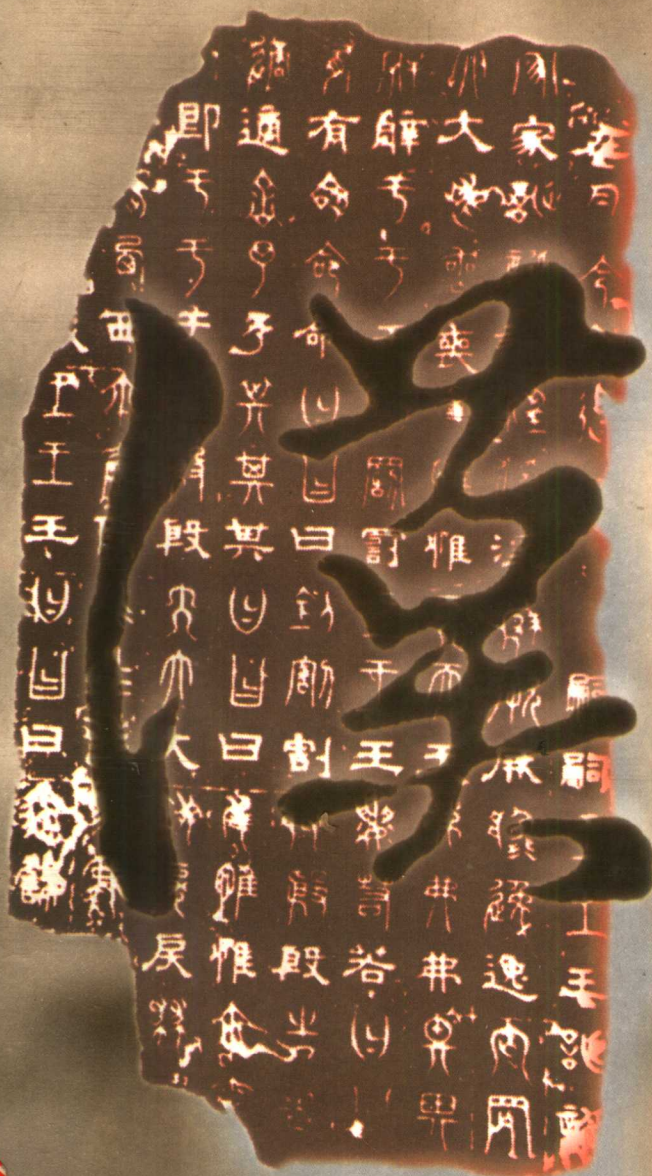


汉语·汉字·汉文化

胡双宝 著



汉语·汉字·汉文化

胡双宝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汉字·汉文化/胡双宝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3 . 1

ISBN 7-301-03442-3

I. 汉… II. 胡… III. 汉语-研究-文集 IV. H1-53

书 名: 汉语·汉字·汉文化

著作责任者: 胡双宝著

责任编辑: 杜若明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442-3/H·366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排 印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56 毫米 32 开本 12.75 印张 32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一版 1998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弁 言

30 多年发表的文章收集一起,选其中较有内容的 52 篇,编成这个本子。

大致按内容编排。有关文字(汉字)的较多,便把它排在前头。

关于文字改革,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是汉语拼音化的拥护者。1979 年写的《有关汉语拼音文字的几个问题》,是在试图设计一种近于理想的拼音文字方案过程中思考诸种问题的产物。随着从事汉字教学而对汉字了解的加深,逐步认识到汉字与汉语是基本适应的。同样,我拥护 1986 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纪要》对汉字简化问题的表述。

书里有好几篇文章说及吸收外来词的问题,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具体意见前后有变化。

有关家乡话文水方言的文章,1959 年发表过《山西文水话和普通话字音、词汇的比较》,其内容已经反映在 1990 年出版的《文水方言志》里,这里不再收录。1986 年发表的《文水话动词例释》,音标符号太多,不予收录。

我教写作课的时间比较长,自己觉得有一些体会,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尽可能帮助同学学会修改文章。这里收录有关写作的文章两篇。关于修改文章的一篇,是根据为两本教材写的相关章节整理改写的。

1959 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曾经试图研究京剧。围绕京剧写过几篇文章,这里只收跟语言有关的一篇。

1984 年到出版社工作,编语言方面的书,也编图书馆学和其

他方面的书；写书评自然成了应分之事。这里收录与语言文字有关的几篇，按内容排在相关部分。

语言文字与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本书中许多文章，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汉文化。古籍校勘和整理，一向与语言文字研究紧密相连，属于传统的“小学”范围。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参加《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的校点。1979年前后，应约参预标点《毛诗注疏》，承担大雅和颂的部分，遂有《〈十三经注疏正字〉作者辨》一文；约十年后，合作收集、整理、校勘全汉赋，又有《关于〈文选〉五臣注本》一文。

朱德熙先生对我教诲良多。他逝世后，写过两篇纪念文章，两篇各有侧重，今依写作时间前后，标以一、二，合为一篇。1983年至1987年，与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先生联系接触较多。《悼念桥本万太郎教授》一文，主要介绍他有关中国语言的研究成果。

《王安石〈字说〉辑佚》，始于1974年，陆续缀辑，1987年以简化字刊于《古籍整理与研究》总第三期。这次又重加核校，用繁体字排印，附于文字部分之末。

收在这本书里的文章，只做了技术性的改动，除目录中未标发表年份的三篇，均未作内容的增删。属于内容的补充，则反映在注释里。所以有些文章现在的注释比发表时多了，长了，特别是引了一些后出资料。

所引《现代汉语词典》资料，均为旧版。

关于数字的使用，由于常用十七八世纪、五六十年代之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等也就用汉字表述了，以求统一。

作者识于牛年秋月

目 录

关于汉字的性质和特点(1988)·····	1
说说汉字的功能(1987)·····	9
文字问题三议(1992)·····	12
汉字与汉语相适应(1997)·····	17
规范化是社会用字的基本要求·····	22
声旁的表义作用(1995)·····	30
略论汉字字序的规范(1992)·····	38
海峡两岸用字异同议(1993)·····	43
繁简汉字话短长(1991)·····	51
汉字的繁化与简化(1992)·····	58
汉字的文化蕴含与汉字教学(1997)·····	63
汉字编码方案的规范和优选(1996)·····	76
评《文字学概要》(1989)·····	80
读《文字的产生和发展》(1988)·····	89
读《新汉文化圈》(1994)·····	95
附:王安石《字说》辑佚·····	99
有关汉语拼音文字的几个问题(1980)·····	161
汉语拼音正词法纵横谈(1982)·····	174
正词法和正词法词典的编写(1988)·····	186
《汉语拼音词汇》同音词再统计(1981)·····	190
对如何吸收外来语词的意见(1958)·····	194

“普通话”两题(1981)·····	197
语言分析中的零概念(1981)·····	202
语言运用对话(1981)·····	207
从“明确 de 回答”说到词类(1979) ·····	212
“给他糖吃”及其他(1988)·····	217
歧义、词义及其他(1980) ·····	219
语法 逻辑 习惯(1991)·····	224
同形词说略(1984)·····	231
说“哥”(1980)·····	245
说“临”(1982)·····	256
“汉语”一词的最早记载(1988)·····	261
张志公先生和汉语辞章学(1993)·····	262
语音琐谈(1980)·····	267
谈京剧现代戏的字音和韵辙(1965)·····	274
文水方言的若干语法现象(1981)·····	283
文水话的量词、代词和名词(1983) ·····	298
文水话的自感动词结构“V+人”(1984) ·····	311
评《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1994)·····	316
北京话语汇研究略论(1992)·····	322
高瞻远瞩,一空依傍	
——读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1986) ·····	327
评《汉藏语概论》(1994)·····	335
评《汉语概说》(1996)·····	340

《语法答问》读后(1986)·····	344
重读《语法修辞讲话》(1991)·····	349
母语制约第二语言的学习(1981)·····	353
大学写作课六题(1983)·····	358
关于修改文章·····	365
《十三经注疏正字》作者辨(1990)·····	383
关于《文选》五臣注本(1990)·····	386
悼念朱德熙教授(1993)·····	389
悼念桥本万太郎教授(1987)·····	397

关于汉字的性质和特点

一、说到汉字的性质、特点,往往多只看到它是方块字,与语音脱节,难认难写难记,近年来又加了一条:难以进入电子计算机,影响四化建设。这是主张实行拼音化者的评价。不赞成拼音化者则认为,汉字表义性强,形体优美,举世无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等等。两种观点所取标准不同,各有相当道理,又各有其片面性。究其原因,实在是于对汉字的性质、特点、功能缺少一个科学的认识。这里只就现代汉字而言。现代汉字与古代汉字的性质,总的看是一致的,但又不是毫无区别。为了讨论的方便,以下将尽量不涉及古代汉字。

二、讨论一种文字体系的性质,往往离不开与他种文字比较而显现出的优点和缺点。也就是说,事实上存在一种以汉字为一方,以拼音文字为另一方的比较文字学。最早进行这种比较并得出拼音文字优于汉字结论的,当推明朝末年的方以智^①。方以智精通小学,熟悉梵语经典汉译,尤其是当时新传入的欧西拼音文字。他在所撰《通雅》中说:“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这类比较,尤其是所得出的倾向性明显的结论,在清朝末年形成了一股潮流,并且延续了很长一个时期。

以往的比较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孤立地就文字与文字比较,而没有考察各种文字与所从出、所记录的语言的关系,这样得出的结论,未必是科学的,从汉字的角度的讲,也未必触及汉字的性质和特点;至于认为汉语是落后的语言,汉字是落后的文字的观点,则是

那股潮流中的一个支派,其不科学性,更是显而易见的。

三、汉字具有与其他文字共同的特点,如果从语言和文字的关系看,就是:语言是基础,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这是通行的最一般的观点。问题在于,人们往往强调文字的从属性,而忽略了它自身的系统性(比如上文“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后边就应当加“体系”二字),它的能动性(维持其系统性,对语言的反作用),等等。

至于汉字的特点,这首先要从它和汉语的关系中去考察,考察汉语何以选择了汉字这种书写符号体系。我想,不能简单地归于偶然性,不然,就无法解释汉字对汉语的适应性,即汉字长期以来为汉语服务,不适应的一面是其次的,非主导的;历史上没有走世界许多文字的拼音化道路,也没有为别的文字体系所代替,如今要代替还代替不了,这是客观事实。

汉字与汉语的适应性,至少包括下列这些方面。

1. 方块汉字与汉语音节一一对应。zhuāng, ā 都是一个音节,写作“庄”、“阿”,都是一个方块,这是语流单位与书写单位的对应性;二十画的“耀”和只有一笔的“一”,都是以一个个方块为单位的,也就是在平面上是等积的,而且纵横边长分别相等,这是记录语流单位的各个书写符号之间位置的对应性。

2. 汉语音节有义,一个个汉字也有义,即汉字不仅仅是书写符号单位,就是联绵词中单个的字,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其中不少也实际上获得了意义,在若干情况下可以单用。^②

3. 汉语音节数少,语素数多于音节数。所以,汉语音节往往是多义的,一个音节包括多个汉字。汉语的语音结构系统决定了音节数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历史上却产生了几万个书写符号——汉字。即在现代汉字这一平面上,7000左右通用字,分布于1200多个带调音节,平均每音节含字数是6个左右。汉字起了分化多义音节的作用,虽然未全分化为单义的。应当说,在书面上,汉字起了重要的补充作用,这或许可以说是文字的能动性的一种表现。

这里要特别说到形声字。几万个历史汉字也好，几千个现代汉字也好，形声字都占绝大部分。一个形声字，从整体看，是一个新的结构单位，但其组成成分是旧的，是已经掌握一定数量汉字的人熟知的，不仅辨认形体结构不难，意义关系也不是全无规律可循。简单说来就是，声旁表音又表义，形旁区别意义类别，起定位作用（详见拙作《声旁的表义作用》）。

4. 形声字的这种“生字熟旁”很值得注意。它与汉语构词上的“生词熟字”，不仅相似，而且简直可以说是相当一致。造新词是语言问题，但表现在书面上，造词所用的材料是字。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时贤多有论述。词与字的上下位关系，可以启发我们认识字与偏旁的上下位关系，从而或可窥见汉字的一些特点。

5. 汉语的语音结构特点决定了汉语的语法手段，除了词序等等之外，“加词法”（我杜撰的名称；“词”，这里先用其模糊义）也不失为重要特点，如：

(他) + 的
 [(他) + 们] + 的
 (走) + 了
 [(看) + 过] + 了
 [被 + (他)] + 打
 [把 + (他)] + 打[®]
 ……………

口头上表现为音节，书面上记写为与音节相对应的汉字；语法单位只发生语调的变化，语音变化是在一个音节之内，汉字则适应音节，而不管语调变化。如果暂不考虑近代产生的儿化现象等，这应当说是汉字适应汉语语法特点的一个方面。在许多外语，语法往往是通过词的语音屈折·词形变化体现的。

6. 在以上汉语与语音、构词、语法的关系之中，还应当增加一项如吕叔湘先生《语文常谈》25页所列“长、涨、胀”字形与 cháng,

zhǎng, zhàng 各音交错所反映的形旁别义与四声别义的分工和配合。简单说来,语义、语法手段的变化,或者是通过声调,或者是通过形旁,或者是二者兼备。其中不无汉字的作用。

7. 从汉字与汉语中上述语言单位的关系看,汉字大致是与语素(≤词)对应的。汉字可以称作语素文字。

四、成熟的文字体系中的独立书写单位(汉字,或别的文字的词),都必须形、音、义均备。也就是说,凡文字,必然有形、有音、有义。说某种文字是表音文字,是因为它表音比较直接,音是显性的;说汉字是表意文字,是因为它表音不那么直接,音是非显性的(不完全等于隐性的)。王士元先生根据文字与语音关系的远近,把世界文字分为四种类型,汉字列为第四种,离语音关系最远。但是他说:“无论从哪一种语言来看,文字和语音总是有一种固定关系的,只是这种关系的远近不同,距离不同而已。”^④——文字似乎并不是不表音的。布龙菲尔德认为,表意文字“是一种很容易引起误会的名称”^⑤,虽然文字总是表意的。看来,表音文字、表意文字这些名称不大能揭示文字与语言成分间的关系,正如不曾见人称某种文字是表形文字一样,虽然文字总是有形的,而且“形”总是显性的。由此,可以确定把汉字称作语素文字的合理性。

文字是语义的载体^⑥。形、音、义三者之中,义是核心。不同类型的文字,形、音、义之间的关系不完全相同。这方面的比较,有助于我们认识汉字的特点。简单说来,一般拼音文字三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形·(音·义)”,汉字三者的关系则似乎是“(形·义)·音”。汉字字形和字义的关系比较近些,比如某些读不准甚至读不出的字,却可能知其义。

五、文字既成为一种体系,就有它本身的一些特点,其中包括与语言特点不相同、不相一致的方面。汉字的情况也许更突出些。

1. 语言是听觉符号,文字是视觉符号。这是极普通的常识,却是十分重要的区别。也许因为它太浅显了,常为一些讨论文字特

点、作用的人所忽略或遗忘。这里不拟多加申说,只指出两点。第一,盲人语言无障碍,与正常人可以口头交际;聋哑人可以习得文字,与正常人可以书面交际。相反的交际途径则不行。第二,上述语言、文字的概念,不包括手势语、盲文等特种符号系统。

2. 文字与语音相比,是第二位的。可是,文字对语音乃至语言的反作用,不可不加关注。王士元先生举过瑞典文的例子:词尾以及词中元音后的某些辅音,在二三百年前就不发音了,本世纪初由于教文盲识字要按字母读音,已经不发音的辅音又发音了。他还推测,简化字“邻、进、宾”(-n)等选用了“令、井、兵”(-ng)作声旁,会不会受文字的影响,这些字的读音由舌尖鼻韵尾变为舌根鼻韵尾^⑦。至少,“械”因声旁“戒”而多误读作 jiè;“荨”声旁为“寻”而常误读,有人主张干脆规定读 xún,1985年12月修订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已按“qián(文)~麻/xún(语)~麻疹”处理;声旁为“散”的“霰”,《现代汉语词典》收了 sǎn 音^⑧,这些都是事实。

3. 各种语言的书面语与口语总有一些距离,只是远近大小不同。汉语,即使是现代汉语,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大些,这是人所共知的。究其原因,民族文化、心理习惯是一个方面。由于长期的历史影响,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用大白话写的东西不大被算作是文章。一些力主用口语写作的学者,他们的论著却是严谨的书面语,很少有例外。这固然是所论内容决定的,但是也与习惯有关。似乎可以这样说,汉语书面语的表现力更强些,虽然它源于口语。其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汉字提供了这样的条件:汉字所含有效信息量大,表义明确,可以用简约的形式表达丰富而深刻的意义。汉字的这一特点还表现于日文。吉川幸次郎先生说:“很难用假名写出哲理性的论文来。”桥本万太郎先生说得更明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是现代日语里没有汉字词汇,日常思想交流就会产生重大的障碍。”^⑨

4. 看到了汉字系统自身的一些特点,并把它反映到对汉字性

质的表述里,汉字可以算作语素/义素文字。前述“加词法”,可以称作“语素/义素接续法”。义素这一概念,更适合于句法关系的表述。

[讨论发言]^⑩

我赞成许多先生的意见:在研究上,尽可能把现代汉字和古代汉字分开。这不仅有利于实际运用,也有利于讨论。

讨论当中,大家争论形声字中形旁、声旁的作用等等。所以发生争论,根本原因不仅在于声旁的表音作用大大降低了,还由于形旁的作用长期以来被简单地误会为表义部分,因而对形旁缺乏一个科学表述。

我想,如果不考虑出于各种需要的形体结构部件拆合,而只在一般语文工作(如中小学语文教学)范围内,可以为汉字在一个层面上建立三个形体分析单位:表音符号、表义符号、别义符号。在对现代汉字进行层次切分时,用这三个单位可以切出二级单位。具体说来就是:

单体字都是表义符号。单体字出现在传统称作形声字里声旁的位置时,是表音符号,出现在传统称会意字的字里时,是表义符号。

形声字是表音符号与别义符号的组合。会意字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表义符号的组合。

以上三种单位,与裘锡圭先生论述汉字性质的文章里分为表音符号、表义符号、记号三种单位,所包含的概念不同,更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这里说的三单位是可以互通互易的。一个分析单位要在一个具体的字里确定它的性质,也就是一个单位在不同的字里有不同的性质。以“米”字为例,作为单体的“米”和在“糞”等会意字里,它是表义符号;在“迷、咪”这类形声字里,它是表音符号;在“粮、粉”这类形声字里,它是别义符号。——这里把“米”称作别义符号而不称表义符号,因为在形声字里,表义作用更多地是由声旁

(这里称作表音符号)承担的。

有的形旁永远是别义符号,如:“讠、亻、讠、钅”等,有的表音符号永远是声旁,如:“朗、郎”的“良”。这两类都不能单用。建立别义符号这一名称,还有利于分析由繁体形声字简化而来的非形声字以及难以简单确定是形声还是会意的合体字。“难、鸡、赵”等字的“又、义”可以认为是别义符号;“又”又可以是表义符号,如在“汉,叹”等字中,讠旁、口旁才是别义符号。所以现代汉字还有别义符号和表义符号组合这种类型。像“类”,这样难以简单确定是形声还是会意的字,看作两个表义符号的组合或一个别义符号和一个表义符号的组合,都是可以的。

把形旁改称或至少理解为别义符号,与形旁区别字义类别并使之更加明确这一作用是一致的,因而也可以用来分析非现代汉字。

附 注:

- ① 宋·邓肃《栢桐集·奏札第十七》:“夷狄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烦;烦,故迟。”邓肃又说:“太祖太宗之时,法严而令速,事简而官清,未尝旁搜曲引,以稽赏罚”,“自时厥后,日趋太平,群臣无可论者,今日献一策,明日献一言,简发数米,惟恐不备。此文书所以日益烦而政事所以日益缓也”。这些话足以说明邓肃所指“文书”的含义。用今天的话说,邓肃攻的是文山,说的是文风问题。以情理而论,创制于十世纪的契丹文及创制于十二世纪初的女真文,似不大用于与宋交往的文书,尤其是创制于邓肃生活当时的女真文。再者,契丹文、女真文仿制于汉字,与汉字相比,并不十分“简”,两种文字的传世文献可以证明这点。自1896年汤金铭于《〈传音快字〉书后》引述起,这段话便被作为对文字工具难易的古典论述征引,文句亦误作“外国之巧,在文书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故迟”。
- ② 参见史有为《划分词的普遍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中有关“准语素”的论述,《语法研究和探索》(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他举了“口蘑、香菇”

一类例子。

- ③ 以有无括号、内外括号表示层次。下同。
- ④ 见1979年在北京大学所作的学术报告《语言和文字的生理基础》，《语言学论丛》第11辑，131页，商务印书馆，1983。
- ⑤ 《语言论》，360页，商务印书馆，1980。
- ⑥ 邢凯《语言是信息的载体》（《百科知识》，1986年11月）从另一个角度论述语言的功能，这里借他的说法，对文字的功能作如上表述。
- ⑦ 同注④，131—132页。还可以补充的是，在字形上，“盡、儘”合并简化为“尽”，“尽量”、“尽管”的“尽”，在现在三四十岁的北京人嘴里已经大多读（或说）成jìn了。
- ⑧ 1996年修订本未收。
- ⑨ 《语言地理类型学》，18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按：所谓汉字词汇，包括日本汉字词汇，但主要是源自中国汉字的词汇。又可比较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56—157页的论述：“妨碍中国汉字过渡到字母-音素文字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这一过渡会中断同中国多少世纪以来用汉字体现的古老文化的联系。这种情况还会由于汉字不仅有音值，而且有实意（甚至相当复杂的意义）而加剧。所以汉语的文章由于所用汉字的内在书写结构，甚至由于汉字相互组合的不同，还可能获得修辞意义的色彩；汉字的这一特点曾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广泛使用，如果用字母来表达，这一特点就会消失殆尽。”
- ⑩ 本文正文是1986年12月提交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会后出版的论文集，收有讨论发言。

说说汉字的功能^①

讨论汉字的功能，至少离不开以下两个方面，记录文献和学习的难易。前一点无需多说。跟别的文字相比，用汉字记录的文献久远、完整、丰富、可识，只要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至于后一点，则有明显的争议。

汉字是不是难学，在古代，很少有人谈及，至少不那么突出。近百年来，人们纷纷非难汉字，似乎它成了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成了国家变革、进步的绊脚石，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非用拼音文字代替它不可。近年来，人们的认识有了一点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不是因为五六十年代推行了一批简化字，汉字不那么难了，而是因为人们对汉字的性质、特点有了新的认识，在研究方法上，较多地注意汉字和汉语的关系。

汉字和汉语有很大的一致性，这在民族心理上就抵消了所谓难学的一面。在许多人看来，自己民族的文字本来就是这样。至于旧社会识字的人少，那是社会问题，别的国家也存在，不能简单地说是因为汉字难学，所以中国识字的人少。^②

有人援引非汉族人（外国人、国内其他民族的人）学汉字的情况，说汉字难学。有人援引小学生学汉字的情况，说汉字难学。这里至少有个教学方法问题。方法科学，非汉族人、小学生学汉字学得快的例子也不少。有人用拼音提前读写的实验来说明汉字难学。可是也有阅读、识字并重，学生在短期内掌握了大量汉字的例子。在这里，同样也有教学法的问题。

说汉字难的人，往往是拿一个字或一个偏旁，跟外文的一个字